

神秘人物

(一) (本文插圖刊第73、74頁)

●李甲孚

不自欺欺人的特工

中國情報界的人物，由於他們很少跟大眾打成一片，工作又必須保密，外界對他們莫測高深，視為神秘人物，批評起來難免見仁見智。而且他們常常置身於政治上很敏感的事象之中，自身的派系又那麼複雜，被人醜化也是常有的。

我個人的淺見是：活在民主社會中的每一個人，不論其人的政治背景如何，人的尊嚴都必須受到尊重才對，何況在情報工作族羣中，君子型的人物有的是，本文寫的鄭介民就是君子型不自欺不欺人的特工人員。

鄭介民雖然作古已久，他的影子好像還活在人間似的，因為他那個名叫鄭心雄的公兒，長相長得跟鄭介民很像，心雄死了以後，世人才把鄭介民淡忘下來。

前些時的報紙，又提起了鄭介民：台灣有一個私人團體，去到大陸訪問，來見該團體的賓客中，有一人自稱是鄭介民的弟弟，名字叫鄭庭笈。這個名字好熟，以前好像聽過，我立刻撥一通電話，問一位跟鄭家熟悉的朋友：「鄭庭笈是否

為鄭介民弟弟？」他回答我道：「鄭介民有兩個堂弟，一個堂弟叫鄭庭鋒，在台灣當過軍長司令，鄭庭笈也是他的堂弟，在東北當軍長時被俘。」

鄭介民諱名庭炳，字耀全，廣東省文昌縣霞水村人。他過世後，有人為他寫傳，說他別號杰夫，據我所知，鄭介民只在軍統局批公文時，用杰夫作他的簽名，他在軍令部以及更早在參謀本部，公文上用的名字都是鄭介民，庭炳和杰夫兩個名字，聽說前者用過，後者偶爾一用；也有人說他原名炳南，雖自有其出處，但瓊崖霞水村鄭家，確實有庭字的派行，鄭庭炳、鄭庭鋒和鄭庭笈都是。

鄭庭炳改名為鄭介民，有一段值得一提的故事。他在廣東省立瓊崖中學念書時，就已參加當地的民軍，而從事革命活動，傳說他當時曾經被捕，交保開釋之後，他就改名為鄭介民，並化裝逃到馬來亞，在那裏經營小本生意，以之維持生活。直到黃埔軍官學校成立，他才趕忙回國，考入該校第二期肄業，他的同鄉黃珍吾，當時也在軍校第一期就讀。

那個時期，國共兩黨正在合作，考入黃埔軍

校的學生，遂自然形成兩派，一派歸中國共產黨黨團掌握，對外名稱是青年軍人聯合會，一派是由中國國民黨黨員組成，以孫文主義學會對外，鄭介民黃珍吾都是其中首要分子。介民在軍校二期畢業後，並有機會去俄國留學，念的學校自是莫斯科中山大學。那個大學是共產黨大本營，學生如不加入共黨，根本不能立足，遑論深造？介民是一個不自欺、不欺人的人，他只得離校回國，把實情向蔣中正校長報告，那時的蔣校長，已經身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，身邊正需要可靠的人蒐集軍事情報，他遂被派在總司令部，擔任蒐集情報的工作。這就是鄭介民致力情報工作的開始。

情報工作，歷代都有，念過孫子用間篇的人，都知道情報的主要功能：旨在知敵、料敵、欺敵和誤敵，以達到知己知彼，百戰不殆，是兵家在作戰上，為求消滅敵人、爭取勝利，一種必須運用的謀略。孫臏和龐涓當年在戰場上交鋒，孫臏用計誤敵，龐涓就死在他手下；孫臏之所以能在戰場上戰勝龐涓，就是他在知敵料敵上下過功夫，故意用計欺敵誤敵的結果。這個故事，文獻史料語焉不詳，很難了解其真相，一九七二年四月

「孫贖兵法」一書，在山東省臨沂縣一座古墓出土，孫贖寫的那篇「擒龐涓」計畫，把他料敵、欺敵、誤敵的方略，都在書上抖了出來，大家才對這個古老故事耳目一新。是知情報工作，是老祖宗傳留下來的，不是見不得人的，西方國家不也有最科學、最進步的知情報工作嗎？

現代情報工作起源

現代的情報工作，早年我曾接受最高情報機關之命，撰寫過「我國現代情報工作簡史」和「情報法制」兩書，我在書中寫過：「我國近代情報工作，係應國民革命之需要而產生的，欲明其產生經過，須先體認國民革命建立軍隊之過程，與當時之時代背景」。我把北伐前後的世局態勢，作了分析之後，在另一節接著寫：「我國近代情報工作，初無一定之組織，蒐集情報的人，都是個別派遣，單線領導，諸如一九二五年七月，中國國民黨成立軍事委員會，設立諜報參謀，以及翌年七月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成立，於是年九月設情報員以蒐集情報都是。」

我寫的那本情報工作簡史，不是為某一情報機關而寫，而是站在蔣經國先生當時統領全國情治機關的立場而落筆的。我在書中提到：

——中國共產黨奪取革命領導權的逆謀既萌，中國國民黨遂於一九二七年四月開始清黨。為期調查共黨分子，於是年十月一日，在中央組織部設調查科，主任一職，由組織部秘書陳立夫兼任。另外，早在是年八月，蔣總司令為達成寧漢團結，他一度辭職，迄翌年（一九二八）一月才

又復任，他下令：在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設密查組，派戴笠入兩農任組長。

——一九三〇年七月，中央組織部調查科，改組為中央特工總部，對外仍用舊名，並在湘鄂贛三省成立特務室。

綜上引述，說明鄭介民自蘇俄回國後，蔣中正總司令派他在總司令部擔任情報工作是不虛的。因一九二六年九月，蔣兼校長曾派黃埔軍校二期畢業學生胡靖安回到廣州，連絡軍校其他期別學生，第二年，胡靖安並在總司令部擔任警衛安全工作，戴雨農就是於那年應胡靖安之邀，到總司令部擔任情報工作的。至於情報工作之有組織獨形，當推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成立的中央組織部調查科。

默默工作輔佐戴笠

一九三一年年底，蔣中正主席為促成內團團結，共赴國難，毅然辭去國民政府主席等職務，回到浙江奉化休息。行前面命戴笠：在南京主持一個以團結黃埔學生為中心的聯絡組，並分在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北平、天津、漢口、香港、廣州、南昌等地，建立組織，任務只有一個，就是蒐集各地的情報。聯絡組的人選，除戴笠本人外，其餘有唐縱等八人，這是根據戴雨農先生年譜△以下簡稱年譜▽而寫的，裏頭沒有鄭介民的名字，證明鄭介民當時還沒有參加戴雨農主持的情報工作。

一九三二年「一二八事變」發生，日本軍閥向上海出兵進攻，守軍對來犯日軍，予以重創，

日本計不得逞，是年三月，日本軍閥挾持溥儀自重，在我國東北成立偽滿洲國。我在情報工作簡史上寫了下面一段話：「國民政府為強化軍事指揮，成立了軍事委員會，直屬國民政府，由蔣中正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，兼參謀本部參謀總長，負責救國」。蔣委員長遂於一九三二年三月十八日就職。

在這件事情的幕後，中國出現了一個以黃埔畢業學生為團結中心的組織。這是現代史上沒有「書」的一件大事。這個組織的全名叫「三民主義力行社」，於一九三二年二月廿九日在南京成立，以力行三民主義與復興中華民族為宗旨，蔣兼校長曾對黃埔軍校六期以前的畢業同學賀衷寒：等二十八人，以「知難行易與致知力行」為題，發表講演，告訴大家：「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任務」，是「復興中華民族固有的致知力行精神」，其目的仍是「實行三民主義」。三民主義力行社成立之後，中央總社只設書記：……特務等五處，特務處長最初派桂永清出任，並派戴笠為助理，桂永清因另有任務請辭，蔣兼校長才改派戴笠接任，並派鄭介民為助理。這應是戴鄭二人在情報工作上合作的開始，鄭介民自此成為戴笠的同志，體制上鄭是戴的部屬。

三民主義力行社特務處，於那年（一九三二）四月一日成立，年譜記載：特務處是「就原聯絡組之基礎擴編」而成，幹部人選，依序是書記唐縱，偵查科長鄭介民△餘略▽，年譜上也有戴笠請蔣公指派軍校二期同學鄭介民為助的記載。當年（一九三二）九月，力行社特務處就改

練了。依我寫的情報工作簡史所述：「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，為統一情報工作之指揮，於軍事委員會設調查統計局，置局長及第一、二處，局長陳立夫，第一處設六科，外勤部署悉如其舊，第二處設三科，外勤改設通信組，兩處工作人員，悉由中央組織部調查科及特務處人員調派。

鄭介民在特務處未成立前，近人寫他已在參謀本部担任上校參謀工作，也有文章記載，鄭介民其時的職稱，是參謀本部的副處長，他曾跟戴雨農聯絡，以參謀本部名義辦一個訓練班。辦訓練班的事，年譜確有記載，訓練班主任是王固磐，教育課長即鄭介民，其他成員是：訓練課長李士珍，事務課長是戴笠，而由戴負責實際主持責任，李士珍並兼該班的大隊長，班名為參謀本部特務警察訓練班。

鄭的傳記又記載：鄭介民於一九三三年奉派赴歐洲考察，秋天回國後，升任第二廳的處長，官階也升為少將。但年譜記載，當年五月，軍委會北平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，曾令軍統局第二處派駐北平特派員鄭介民，偵辦華北軍閥張敬堯受日軍特務機關勾結、突擊平津一案，唐縱在台的撰文，也提到「抗戰以前和抗戰期中，介民先生經常輔佐戴雨農將軍，默默的埋頭工作，戴將軍在工作上遇到困難，常請他出來解決」。

軍令部二廳副廳長

一九三七年七月，日本軍閥向我國挑起一場侵略性的戰爭，中國人憤而起來抵抗。軍興之後，我國軍事機構，有陸海空軍大元帥之設，大本

營設一至六部，軍委會調統局原擬改為第六部，當時的國民政府，主席另有其人，不過年事已高。蔣委員長謙沖為懷，他以為軍事委員會本來就是戰時組織，因而，他以軍事委員會委員的名義，去代行大元帥的職權。大本營一至六部的擬議，遂作罷論。

日本這個國家，以情報聞名於世，我國既對日本開戰，情報工作因而成了對日軍作戰中的靈魂。情報機關為了因應對日抗戰需求，於一九三八年八月，開始作如下的改制：（一）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第一處，改稱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，由秘書長朱家驊兼任局長，實際負責人，是副局長徐恩曾。（二）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第二處，升格為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以下簡稱軍統局V，局長由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兼任，實際負責人是副局長戴笠，該局首任秘書主任（在第二處時代稱書記長）就是鄭介民。前文提到的參謀本部，其時已正名為軍令部，鄭介民當時的職稱，是第二廳的少將副廳長，年譜記載一九四〇年後，軍統局秘書主任，由毛人鳳代理，事實上鄭主任秘書每週仍有一天上午，去軍統局批辦毛代主任留給他批的重要文件。

和厚待人有說有笑

這裏我必須來敘一下我跟鄭秘書主任相處情形。我是一九四三年從安徽廣德敵後，調回重慶工作的，指名調我的是戴笠副局長本人，去敵後工作，也是戴副局長指名派我去的。戴副局長那次去到廣德，我奉令帶一批同事和武器彈藥同去

，我們走到福建建陽，才跟戴副局長一行會合，一同去到敵後，我的軍階升為上校也是戴副局長在廣德時，親自批定的。

我和軍校高教班學長袁寄濱兄，同自前方調到秘書室工作，報到之後，才知道主任秘書雖是鄭介民，毛人鳳則是秘書室的實際負責人，所幸早在一九三八年年底，我從保衛大武漢戰役中撤退到重慶時，已經在局裡拜見過毛先生入軍統局當時在重慶陝西街辦公V，鄭主任則是初次相見，鄭當時去軍統局秘書室批辦公文的時間，好像是每週星期三的一個上午？

在軍階上，少將和上校原很接近，軍中講究階級服從，但鄭主任在業餘時，生活上和大家打成一片，他對同事滿有親和力，態度非常和藹。他把公文批完，就叫工友把它送還毛代主任，在辦公室的同仁和處室主管們，有時去向他請教世局問題，以及軍事情報上一些謀略運用問題，他都不厭其煩的，向我們娓娓道來，有時他還說些個案上的趣譚。他的外表，正如陳大慶上將在台寫文說他的「和厚」二字，他是一個「望之溫文儒雅，即之和藹可親」的人，他「無論對任何人，都很誠摯謙虛，人亦樂於與之接近」。

一九四四年，鄭介民升任軍令部第二廳廳長。他以這個理由，寫信向戴副局長請辭在軍統局兼的職務，戴副局長會親筆回信給他，大意是：兄是領袖親派的，我不能准兄辭職，兄之工作，可交毛人鳳代理。打從此起，他就不來至批辦公文了，但軍統局每週舉行的紀念週，如戴副局長公出，他會被請到羅家灣局本部來主持，並向大

家講話。

實至名歸接長軍統

鄭介民主持的軍令部第二廳，它在抗戰中期扮演的角色是滿吃重的。依我寫的情報工作簡史所述，該廳的主要業務，側重國際情報的發展，工作地區包括「太平洋、東南亞、美洲、英國、歐非、中東、近東和蘇俄」，以及河內、海防、西貢、曼谷、加爾各答、仰光、新加坡、檳榔嶼、巴達維亞、香港、海參崴、赤塔、伯力等等據點，後者都佈建有諜報小組，有的地區並建立諜報電台。

鄭介民在領導上，特別強調情報的保密，已故的李立柏君，早年曾在第二廳擔任第一處處長，他在台撰文懷念鄭上將時，文中提到：「有一次，鄭先生曾感慨地對我說：世界上任何國家的軍事學校，你如去留學時，所有戰史、戰法，都可公開講授，只有情報一項，絕對保密」。

在謀略運用上，李立柏提到鄭廳長「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未投降前，他對日軍做的一件工作。當時某部有一位在日本留過學的王次長，是海南島人，這個人，日軍對他的底細非常熟悉。有一天，報紙刊出王次長率領軍官多人去印度，日軍信以為真，以為中國軍隊對海南島有所企圖，很快從雷州半島，調一個步兵旅團，開到海南島，增加那裏的防務。美國魏德邁將軍據此稱贊：『這個謀略運用不差』」。這件事，確是鄭介民運用的一件欺敵、誤敵的謀略，我軍當時並沒有向海南島出兵的計畫。

一九四五年秋天，日軍向盟軍投降了。李立柏提到「抗戰結束時，盟方就各同盟國對日作戰軍事情報的準確性，作了一個評估：中國的準確性佔百分之八十以上，美國佔百分之六十以上，英國佔百分之五十以上。在人力物力比較上，中國只佔美國的十分之一，魏德邁將軍稱贊我國情報，做得比盟方出色，謀略運用也不差」。鄭介民當時曾向李立柏說：「我們一切求助於人家，只有情報一項，讓人家來求助於我們，我們必須珍惜這一份光榮。」

我政府正在復員的時候，軍統局局長戴笠卻因公殉職了。唐縱（乃建）在台北寫的一篇文章，提到「戴將軍遇難後」，「總統召見我，問我：他入指戴死後所遭遇的困難問題，我面報總統，最好請鄭介民同志回京。」鄭介民當時在北平，擔任軍事調處執行部三人小組中我政府的代表，他一到京後，才知道有兼任軍統局長的新任命」。軍統局的副局長，並由毛人鳳接任，後一安排自是實至名歸。

一九四六年六月，軍事委員會奉令撤銷，該會統轄的調查統計局，遂改名保密局，並改隸國防部，局長仍由鄭介民兼任，副局長仍是毛人鳳。迨到第二年年底，鄭介民才因工作需求調回國防部，擔任常務次長。

第一任國安局局長

一九四九年年底中樞遷台，第二年，中央當局開始整頓情報機關。當時的新部署是：在國防部之下設大陸工作處，這個担子又落在鄭介民的

雙肩上，他是以參謀次長身分兼任該處的，副處長是葉翔之。一九五二年，中央委員會第二組成立，鄭介民任該組主任，副主任二人，一是王任遠，一是葉翔之。大陸工作當時有三個單位在辦，顯然業務重複，事權不一，形成任何一件事情，每個情報單位都要去管的現象。其他情治單位亦然。當局遂於一九五四年，下令情報改制，國家安全局於五四年十月成立，對情治機關作了明確分工。

當時的情報改制，最大目標有二，一是統一領導，二是分工合作，安全局的首任局長，自非鄭介民莫屬，他就是五四年升任陸軍二級上將的副局長，派的是陳大慶（養浩）。

鄭介民當時已患有高血壓症，曾在醫院治療。在他任內，我因受命撰寫情報教材（如前面提到的兩部），有時見面，在他身體精神都很好的時候，向他作些原則性的請示，這兩部書後來都由他主持的那個機關印行，他的後任陳大慶上將，並為這件事下令給我記功兩次。

我每次見他，話都言不及私，只有我跟潘靜儀小姐結婚，我請他為我證婚，他當時正有病，仍欣然答應了，以後幾年，他又出國治病。一九五七年年底，鄭上將並派我去外島，參加美方八中央情報局辦的一個高級班，地點在距離美國本土不遠一個保密地方，一個月後回國，我應命寫了一本「情報工作」，並已出版。

我有一次晉見鄭上將，是他主動找我去的，他問我為什麼要調安全局？你現在的工作很重要，不能輕離，我回報他：「我根本不知道有調動

」，他才釋然起來。

傑出的軍事情報家

鄭介民上將是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凌晨過世的。陳大慶上將撰文，說鄭上將一生對國家的貢獻很大，「其豐功偉績，將來史書自有記載」，陳大慶說：「在我國情報工作歷史上，鄭先生有莫大的貢獻與成就」，大慶先生且以蘇東坡悼歐陽修的「在上以為天下慟，在下以哭其私」兩句話，道出他「格外悲痛」之忱。但自鄭介民過世後，從沒有人為他寫「史」，我寫本文，正是為此。

我當時正在主編一本大型情報知識月刊。我把本刊向各界徵來的文，在一卷九期出版「紀念鄭上將專輯」，他的舊日老友唐縱寫的紀念文，沒有按時送到，我去向他請示，他說：「這篇文章紀念的不是普通人，我要親自動筆，你下期登它好了」，文章寄到後，唐縱先生大文一開頭就說：

「去年十二月十日午夜之後，凌晨二時左右，北投鄭公館來了電話，我拿起聽筒，電話裏傳來的，是蔣經國先生的沉重聲音：『有事，請你立刻來鄭公館一趟』」。

接著他寫道：「就在一個嚴肅的寒夜裏，一羈為人欽仰的將星殞落了，他帶著浩然的正氣，與不世的勳勳，溘然而逝，但他不朽的光芒，卻永遠照耀於革命史冊，也永銘於無數共患難、同甘苦的革命者心版之上」。

唐文以下寫的，是鄭上將於一九五七年間，

利用養病空暇，寫成三十多萬字的那本軍事情報學。唐縱評論這部書，是水準極高的巨著，內容係基於國家戰略觀點，來建立情報的學術地位。唐縱並且說：「書中對謀略與反間，尤多獨到見解，不只在國內情報學術上，是權威之作，即在世界性的軍事學上，亦有其不朽的貢獻」。

那本專輯還登了調查局長張慶恩寫的專文，題目是「鄭介民上將的情報思想」，是我擬的，文章則是張局長要我代筆的，寫完之後，經他核定才發表。巧的是我代寫的那篇文章，也是以鄭著軍事情報學為撰述重點，張文刊在一卷九期，唐文後到，刊在一卷十一期。

李立柏寫的紀念文，引用鄭上將生前說的話，頗富哲理，諸如：「一件情報，不能有一句假話，虛字也要避免，因為一句話或一個字不正確，會影響指揮官的判斷和決心，使之發生錯誤」

；又如：「一個情報人員的最低條件：(一)要有高尚的品德，(二)不能與習俗相同，(三)不能只會說而不行，(四)不重道德、信義、氣節的人，不是一個合選的情報人員」。他強調：「真正的情報人員，他必須是一個大智、大仁、大勇的人」。我現在回想鄭介民這個人，他不就是一位有大仁心胸，有大勇氣概，把大智慧蘊藏在他腦子裏、表現在他平實的工作上的君子型人物嗎？

鄭介民的私生活，據我個人所知，他一生不貳色，外間的人，常把這件事稱許於他，他的夫人柯淑芳當是熟知的。

陳大慶那篇文章並載，鄭介民「平時律已極嚴，從無積蓄，日常生活，至為儉約」，對於公家經費，他是一介不取的，陳文曾舉例說：他「近年因病出國醫治，屢以耗費金錢為嘆」，「他的謙虛，可見其體國之心」。

中外文庫 詩聯新話 謝康博士著 定價一二〇元

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、母性文學、詠史詩、清詩派別。下篇極聯新話；有楊杏佛、吳佩孚、章太炎、康有為、陳布雷、馬君武、曾國藩、左宗棠、胡漢民、邵元冲、謝無量、盧遵甲、徐世昌、鄒魯等名作詩美不勝收。

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——二號聖文書局